

清流傳

辜鴻銘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in China



774153

6180253

ISBN 0-19-586589-8



9 780195 865899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清流傳

辜鴻銘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in China

K256
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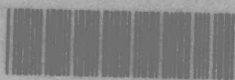
港台書室

清流傳

中國牛津運動逸事

辜鴻銘著

南星譯



774153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Kuala Lumpur Singapore Hong Kong Tokyo
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 Karachi
Nairobi Dar es Salaam Cape Town
Melbourne Auckland Madrid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by Shanghai Mercury, Ltd., 1910.

清流傳
中國牛津運動逸事
辜鴻銘著
南星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589 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中譯序

辜鴻銘(1857-1930)是清末民初有名的怪人。他名湯生，推想是引用《禮記·中庸》「湯之盤銘」，取字鴻銘。他祖籍廈門或晉江，生於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十歲到英國上學，其後還在德國上過學，並到過法、意、奧等國。精通英語，並通德、法、拉丁、希臘幾種文字。二十幾歲回國，聽著《馬氏文通》的馬建忠勸告，改讀中國古籍。思想大變，由熟悉西學變為醉心於孔孟的禮教。外貌也隨着變，蓄髮梳辮，穿長袍，張口子曰詩云。受到張之洞的器重，延入總督幕府，辦理洋務約二十年。清朝遜位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書，譯儒家典籍，宣揚東方文明。好辯，好罵人，好立異，如政體改為共和，他尊君；婦女解放，他欣賞小腳，等等，成為公認的怪物。

辜氏何時作古，有異說，一般辭書多說是1928年，可是我的北大同學馮君說，他清楚地記得，1930年暑後在北大紅樓，他還看見這位怪人，又吳伯簫來北京比我早一兩年，他說聽過辜氏講演，講題是 Chinaman，可見我的多年印象，晚一年入北京大學，未能見到辜鴻銘，是不錯的。也許正因為沒有見到，對於這位怪人，

我更加感興趣。有興趣，就想多了解他，辦法主要是搜羅他著的書以及介紹他的文章，此外還有道聽途說。四十年代前後，我買到他的英文著作三種，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1910年出版的《清流傳》，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義》，中文著作一種，1910年出版的《張文襄幕府紀聞》，買後看後，對於他的為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就更有興趣。興趣之小者是他的英文，有自己的味兒，維多利亞時代的，正如他的裝束，同光時代的。興趣之大者是他思想的怪，雜七雜八，非簡單的是或非所能概括。總之是因為很感興趣，前幾年還寫一篇《辜鴻銘》，收入1990年出版的《負暄續話》。

這裏單說他的思想，有些人認為可一言以蔽之，曰迂腐。我的看法，專抽出其中的某一部分，如無條件地尊君，可以這樣說；至於另外一些，如片面地頌揚東方文明，就寧可說是偏激。偏激是所見不全面，但不是無所見。這所見就未必毫無足取，如在《辜鴻銘》一文中我曾譯《春秋大義·導言》的一部分：

現時的大戰引起全世界的最大注意。我想這戰爭一定會使有思想的人們轉而注意文化的大問題。一切文化開始於制服自然，就是說，要克服、統轄自然界的可怕的物質力量，使它不傷人。我們要承認，現在的歐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經取得成效，是其他文化沒有做到的。但是在這個世界，還有一種比自然界的物質力量更為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裏的情慾。自然界的物質力量給

人類的傷害，是遠遠不能與人的情慾所造成的傷害相比的。因此，很明顯，這可怕的力量——人的情慾——如果不能得到適當的調理和節制，那就不要說文化，就是人類的生存也將成為不可能。

這看法是《尚書·大禹謨》說的「人心惟危」，全錯嗎？至少托爾斯泰不這樣看。不只不認為錯，1906年還寫信給辜氏讚揚中國聖賢提倡的忠恕之道。在修身和治世的大問題上，這二位是同道，都不惜矯枉過正：辜氏是要德不要力，要義不要利，要禮教不要貨財，總之是重視精神文明而輕視甚至仇視物質進步；托氏走得更遠，如在小說《復活》裏顯示的，是「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由我們常人看，他們的處方都失之迂濶，坐而可言，起而難行。但處方不能收效並不等於診斷也失誤。診斷，所見是有病，這病，單就他們作古以後說，大則全球，爭爭吵吵，槍炮聲不斷；小則縮小到古人所謂四海之內，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壓倒一切，為數不少甚至多數人為撈錢而無所不為，於是搶劫、造假之類事遍天下，其結果是上，人生理想，下，日常安全，統統破滅。這不可意的滋長，可意的消亡，使我們不能不想到他們的診斷，就是說，他們重視精神文明、重治心的主張，也就還值得研究、參考。

本諸這樣的看法，我多少年來一直認為，辜鴻銘的三本英文著作，應該譯成中文出版，以期不通英文的人也能看看。這想法，曾同我的老同學南星說過，他同

意，並且立即動手，先把《清流傳》譯出來。這本書的內容，辜氏在《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上《清流黨》一題裏曾有簡要的論述。他說，曾國藩和李鴻章為政重功利，是大臣；張之洞為政重名教，是儒臣，儒臣統率的一派是清流黨。清流黨「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其後對外戰爭節節失利，張之洞才「效西法圖富強」，目的是「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其後康有為等誤會張之洞的效西法宗旨，「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戌、庚子之禍」。他的意見還是老一套，守舊，但談的光宣時期的治平大問題，不顧名教的富強究竟價值如何，確是還值得我們想想。當然，想也不可膠柱鼓瑟：正面說，要參考其精神，確認求治平，心中有德比室中有電視機更為重要。如果這本書竟能產生哪怕一點點這樣的效果，則其迻譯及出版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

譯者南星既是英文專家，又是散文名家，所以其譯文就不只能信能達，而且與原文一樣，能雅。最後說說，作者辜鴻銘是北大舊人，譯者南星也是北大舊人（1936年英語組畢業），我受命寫本文，是家裏的事家裏人辦，不能不感到稀有的欣慰。

張中行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於北京西郊燕園

卷首引語

「我的英國朋友提過這麼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幾個美國人——有美國頭腦的美國人，對美國的正當的前途還有個看法？我幾乎叫他們給問住了。我苦苦想來想去，沒想到各政黨會議，沒想到國會，也沒想到總統，沒想到內閣部長們，更沒想到把美國完全歐化的事，我呀，只想到了最簡單最純正的心靈。於是我答道，『有，當然有。』於是我提出來無政府主義和不抵抗主義。我接着說，無論在哪一國，我可實在沒見過一個大着膽子對我的提法表示贊成的人。我很容易看出來過時的步槍至上論已經破產了，雖然偉人還忘不了步槍至上。有一種槍，不需要另外的槍來陪伴，它的名字是愛心和公正。只有它才能實行乾乾淨淨的革命，這不是天經地義麼。」

——愛默生(Ralph Walde Emerson, 1803-1882)

序

有一天，我和幾個外國人，以討論的方式，把住在上海的中國人和歐洲人的品德加以比較。「這個呀，」一個英國人說，「完全看你的觀點如何。」說起來，這位英國人的「觀點」哲學，就是馬太·阿諾爾德^①所謂大不列顛人特有的無神論的代詞。馬太·阿諾爾德說：「在我們中間，廣泛地流傳着一種哲學理論，其大意是，極其高尚的品德或極其正確的理論是完全不存在的，至少，公認的可實踐的高尚品德或正確理論是完全不存在的。」

馬太·阿諾爾德接着援引倫敦《泰晤士報》所載的一文說：「想把自己的愛憎強加於人是沒用的，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無論何人，對宗教的或世俗的勝境，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

說起來，打算幫助英國人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徒勞的，其原因在於，不僅每個英國人都有自己的小小的看法或觀點，而且他根本不相信有甚麼正確的觀點和錯誤的觀點。我有個可敬的英國朋友，是最穩健的上海企

① 馬太·阿諾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國詩人和散文家。

業家之一，有一次光臨寒舍小宴，我把國內首屈一指的一位書法家的拓本拿給他看，這位英國人說他敢保證他的買辦寫得一手出色得多的好字，至少筆劃更加正規。這就是他自己的小小的看法或觀點。還有一個英國人，也是出身於公立學校、出入上海上層社交界的人物，他對我談起詩來，說他非常欣賞馬可里^②勳爵的《古羅馬之歌》，我便把馬太·阿諾爾德對《古羅馬之歌》的評論給他看，其文曰：「從那些貌似黃鐘之曲中，你若能夠辨認出來瓦釜之音，才算得上有點品評詩情詩味的資格：

塵世人人皆有死，

莫問來早與來遲。

讀了馬可里勳爵這兩行詩句，誰能禁得住迸發一聲響亮的長嘆呢？」然而，那個公立學校出身的英國人對我說，那僅僅是馬太·阿諾爾德的意見或觀點；在他本人看來，馬可里那兩行詩句太美妙了。每個英國人，如倫敦《泰晤士報》所說的，無論對於詩歌，對於藝術，對於宗教，對於政治和文化，怎樣才算高超，怎樣才算完美，都有自己的小小的看法或觀點。

對於中國藝術品或英國詩歌這一類事物，一個英國人發表他的小小的看法或觀點，當然沒有多大害處，然

② 馬可里(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0)：英國史學家，散文家，詩人，政治家。

而，某些英國人，如倫敦《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莫里孫博士和布朗德，可以對故皇太后的為人或對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提出意見，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個穩健的實業家可以評論中國藝術品一樣：一旦這類人士把按照自己的觀點所描寫的對中國局勢的報道發表於倫敦《泰晤士報》，英國政府又根據那種觀點來制定政策，採取行動，那麼，殘酷戰禍的發生，如義和團運動和對北京各使館的圍攻，或者在滿洲進行的俄、日混戰，名為為了文明事業的戰爭，實為更加殘酷的科學大屠殺，就是順理成章，不足為奇的了。

然而，是與非的標準是不是絕對不存在的呢？對於藝術和詩，對於宗教和世俗的常規，以及對於文化，是不是沒有公認的權威真理可以斷定甚麼樣兒才算是出色的、甚麼樣兒才算是不夠格的呢？關於品德或宗教和文化，基督教傳教士總是說，「有，有個標準，就是基督教標準。」可是，這樣的話，中國的學者就要說，「唔，你們的基督教傳教士抬出來你們的基督教標準，我們中國人就抬出來孔教標準。」

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1039-1112)的弟弟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鄉愚初次進城，見了一匹母馬，說它是母牛。城裏人說他弄錯了，說他眼前的牲口叫做母馬，不叫做母牛，那個鄉愚反駁說，「我父親說過這是母牛，你們怎敢說牠不是母牛呢？」因此，只要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的學者說在品德方面或宗教和文化方面，基督教標準是至高無上的，或者，只要中國的學者對基督教

傳教士說孔教標準是至高無上的，他們，基督教傳教士和中國學者，便同樣成為上述的中國詩人所講的故事裏的鄉愚了。

我已在本書正文中說過，「我們中國學者在現代西方物質文明的除舊布新的破壞力量面前，正如英國中產階級在法國革命的思潮和理論面前，一樣地束手無策。」我又說，「打算有效地對付西方的物質文明破壞力量，就需要中國的學者把擴展的重任肩負起來。」這裏，我所謂的擴展就是要有這樣的認識：基督教教義或孔教教義乃是後人由行為準則或紀律準則的理論歸納而成的，並非完美無缺的宗教，正如中國文明或西方文明並非完美無缺的文明一樣。中國學者階層所以束手無策，我說過，因為他們對此沒有認識。西方現代文明無論利弊如何，其巨大價值和巨大力量（說到這裏，我希望與認為我排外的外國朋友言歸於好）在於：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的西方人已經認真地接受了這個擴展的想法了，而且這個擴展的卓見也傳到了中國。馬太·阿諾爾德所說的他看到的英國局勢，正與中國今日的局勢相同。馬太·阿諾爾德說，「我們長期在其中生活和活動的這個閉鎖起來的知識領域現在不是正在開放麼？種種新的光輝不是正在撲面而來照耀着我們麼？長期以來這些光輝無門可入，此路不通，要想讓世人的行動遵循新的方向豈非癡人說夢？當時，人們被老一套的常規束縛得無法解脫，頭也抬不起來，卻把那些老一套的東西叫做理性，叫做天命，真正的理性，真正的天命還哪裏有升

堂入室的希望呢？但是，現在呢，堅守老一套常規——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那種極其頑強的力量已經令人吃驚地讓步了，排除一切新的東西那種極其頑強的力量已經令人吃驚地讓步了。當前的障害並不是人們竟會拚死拚活抱住老一套不放，讓它冒充理性和上帝意旨，而是他們竟會滿不在乎地任憑某些新的東西取代他們奉之為神聖的東西，或者他們竟會以隨波逐流為樂，不願煞費苦心去管真正的理性和天命是否佔優勢了。」

說老實話，不僅在西方，在中國也一樣，當前的障害並不是人們竟會把馬太·阿諾爾德所謂常規，即因襲已久的是非的標準，誤認為理性和天命，而是他們竟會相信理性和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倫敦《泰晤士報》說：「甚麼叫做完美，人人都有自己的小小的看法。」不僅如此，目前，自稱自由黨員的每一個英國人都認為自己對「完美」的看法或觀點即使不比別人的高明至少是同樣可取的，而對我們所謂理性和天命則滿不放在眼裏。因此，一個現代的英國人一來到中國，只因他想用最得意的詭計來賺錢，就搞甚麼金礦呀，賣賤價肥皂呀，或者把錢借給中國人去修沒用的鐵路呀，他把自己對「完美」的小小看法強加於中國人，只要中國人反對，這個英國人便內火中燒，變成好發脾氣的悲觀主義者，像布朗德一樣，他就是以令人作嘔的惡意中傷的文字來反對中國滿族官員的。

深思的英國人讀了布朗德那種人所寫的有關中國滿清官吏的惡意中傷的鬼話和令人作嘔的胡言亂語，也應

該讀一讀故戈登將軍^③已經談過的有關那些滿清官吏的看法。要把戈登將軍和布朗德雙方的觀點比較一下，首先應該想到戈登將軍是世界著名的基督教武士，是一位善良君子，而布朗德只是通俗韻文的聰明作者，是個掃興的中國政府前任僱員。戈登將軍說：「我想的是，如果我們強迫中國人突然進行改革，他們就會羣起反抗，完全像一頭豬那麼頑強；可是，如果我們引導他們，就會發現他們頗為情願，極容易指揮。他願意發表意見，很不願意有一條指定的路線，好像他們都是人微言輕，不在話下的。從前我們試行的做法就是迫着他們遵循某一路線為它出力，認為跟他們討論當前的問題完全是白費唇舌、徒勞無功。……我總是考慮那些滿清官吏不得不與之鬥爭的嚴重困難問題；他們可能完全同意我們可能激勵他們去做的一切，然而不能實行；我們必須承認，嘴裏說要去做這個做比那個實地下手去做容易得多。如果他們在他們的隊伍中不搞改革，我們就跟那些可憐的傢伙大吵大鬧，卻不想一想搞改革必須盡可能地按部就班而且得人歡心。……體諒那些帝國主義者(中國的)的話我暫且不多說了，他們過錯很多，但那些劫

③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國軍官，殖民主義者。1860年任英國侵華部隊工兵軍官，參加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的強盜行為。1863年接替美國白齊文的「常勝軍」的統領職務，配合李鴻章向太平軍反攻。在蘇州、常州一帶焚燒擄掠。1864年任蘇丹殖民政權總督，1885年被蘇丹人民起義軍擊斃。

掠中國的外國人使他們大受侵害；由阿思本艦隊④造成的絕對的金錢浪費，想來令人十分痛心。」

卻說我在這裏要講的是：像布朗德那樣的現代英國人或歐洲人到中國來談進步和改革，我覺得，其精神狀態甚至比我們中國的老學者更頹廢得多。不錯，中國學者只曉得自己的文明，完全不懂他國的文明，然而，至少，對中國的文明有所認識。反之，像布朗德那樣的一般英國人或歐洲人，油嘴滑舌，大談中國的進步和改革，卻甚至不理解本國的文明，實則不知道也不能知道文明為何物，因為他不相信理性和天命的存在，既然不相信理性和天命的存在，這個世界就不可能有文明，只剩下無政府的混亂局面了。

其實，在我看來，現代的英國人甚至比我們中國的老學者更迫切需要擴展，擴展的準確意義是心靈的擴展。然而，心靈擴展並不提醒我們，對我們說，能判定孰是孰非、孰優孰劣的具有無上權威的天命與理性是絕對不存在的。心靈擴展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讓我們能夠領會我們自己對品德至善境界的小小的認識，距離真正的、絕對的、萬古不易的品德至善境界實在太遠太遠了。真的，英國人一旦看清了心靈擴展的意義何在，他就會改變至今還認為正確的想法，就會發現他自己對宗

④ 阿思本艦隊(Osborne Fleet)：英國殖民主義者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1855年任上海江海關稅務司。1863年從英國帶來阿思本艦隊，要清政府購買，條件是由英國人統率，清政府未接受，經美國公使調停，付予大量償金。